

賀喜、科大衛，《秘密社會的秘密：清代的天地會與哥老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284頁。

清代的天地會與哥老會長期以來受到歷史學家的高度關注，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名家輩出，已然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領域。然而，在以往諸多有關秘密社會的研究中，多側重於「社會」而對「秘密」本身關注較少。從這個角度來看，《秘密社會的秘密：清代的天地會與哥老會》一書聚焦於「秘密」本身的研究路徑，可謂是別出心裁。本書作者賀喜和科大衛供職於香港中文大學，賀喜師承科大衛，本書是一部師徒合著的著作。兩位作者有共同的研究旨趣，而且都以傳統中國儀式研究成名[科大衛代表作《明清社會禮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賀喜代表作《亦神亦祖：粵西南地區信仰構建的社會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都是與傳統中國儀式相關的傑出著作。]，同時，還共用着歷史人類學「華南研究」的代表學者這一標籤。故從學術理路來看，本書是兩位學者用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解讀清代天地會與哥老會的傳統和演變機制的嘗試。「這本小書的目的，不是重複前人的研究，而是通過兩個秘密會社的歷史，探討秘密的傳統和演變傳承，換句話說，就是從秘密到範本的過程。從秘密到『秘密』就是這本小書的故事。」（頁7）

作為貫穿全書的核心概念，「秘密的作用是什麼？」是作者在開篇就需要回答的問題。因此，本書在開篇引入了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有關秘密的理論。「齊美爾認為，與他人共有一個秘密，是一種很微妙的關係。有點類似親屬關係。」（頁5）而從秘密與社會關係之間關係來看，齊美爾認為秘密的釋放更是能讓人感受到權力。所以，作者指出「與血緣類似，秘密也可以締造社會關係、社會團體。秘密會社有自身凝固的力量」（頁6）。與此同時，作為秘密會社的天地會所流傳的故事，也與顧頡剛所言的孟姜女故事一樣「承受了各時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眾的感情和想像而發展」。（頁12）上述兩個思考徑路共同構成了本書論述前提，即秘密能夠連接群體和歷史情境與想像，能夠定義共同體的形象並決定其發展。

第一章「讓我們告訴你一個秘密」從嘉慶七年的邊錢會說起，討論了拜會這一儀式在秘密會社中的作用，並進一步分析了天地會從眾多會社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一種特有行為類型的過程。大體而言，天地會的發展經歷了

兩個發展階段：從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間（萌芽階段）；從太平天國起義到辛亥革命成功（從反叛的形象轉變為革命的傳統）。在這個過程中，拜會行為貫穿始終。為何要拜會？是第一章追問的核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作者並不反對以往歷史學家指出的需要保護的中下層民眾自發聯合和可能夾雜反清情緒推動。但是，通過對史料的考據，在入會動機上，「相互照應」和「入會以保身家」更為普遍。「相互照應」是主動行為，「入會以保身家」則是迫於無奈。對於天地會而言，拜會所產生的影響顯著。首先，天地會的拜會儀式成功地創造了一種矛盾：「它的實體不存在，但是它引發的想像無法毀滅。」（頁19）其次，「可能是在於儀式的力量可以引致組織的分化和統合」（頁32）。正是在這樣的作用下，一個跨區域的組織想像得以形成。在此情形下，清政府陷入了兩難，一方面政府明白大量有關天地會的反叛流言多為誇大其詞，並將「斂錢惑眾」視為傳會的目的。另一方面，在虛實之間得以廣泛傳播的天地會對專制體制的威脅又難以消除。於是天地會被官方正式定義為非法組織，然而，正是這一官方定義讓天地會得以進一步散播。「天地會的名稱被列入《大清律》其實是天地會尋常化的過程的頭一步。」（頁54）

第二章「秘密是怎樣散播的？」接續第一章「秘密尋常化」和傳播的討論，聚焦於拜會儀式在天地會散播過程中的作用。開篇作者便引入了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和吉爾伯特·路易斯(Gilbert Lewis)兩位人類學家有關儀式研究的理論，指出前者的理論聚焦於「為什麼」做儀式，後者則強調關注儀式「怎樣做」。作者採納了路易斯的觀點，認為在天地會儀式中，「怎麼做」才是關鍵。「引申路易斯的論點，我們可以想像組織天地會拜會的時候，傳會人也需要知道『怎樣做』……我們不打算把拜會看成『生命儀式』，但是我們相信對於拜會的人，『怎樣做』是關鍵問題。」（頁62）儀式「怎樣做」的目的，則是通過一整套儀式程式，建立起虛擬的天地會架構，使得參與者至少產生「寧可信其有」的觀念，從而推動天地會的散播。為了解釋虛擬的天地會如何建立的，作者從清朝官方文獻中最早有關天地會的記錄，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臺灣林爽文起義開始論述，並認為「拜天地」是早期拜會儀式的重要形式。早期的「拜天地」儀式程式十分簡單，隨着秘密的散播，天地會的儀式也逐漸複雜化、範本化。嘉慶年間設立萬提喜牌位，加入「木場城」的木斗這一儀式中心，被視為儀式程式的重大轉變。在此基礎上，五房傳說、文書誓言、秘藏會簿、劇本問答等諸多要素也加入其中，這時天地會的儀式活動便得以成為一個特定的範式了。作者認為，通過儀式和故事敘述的複雜化和範本化，天地會得以在實質、儀式、語音和文

字三個層面獲得生命力，使得參與者能夠獲得真切的參與感，並在儀式所營造的氛圍中深度投入。「我們相信儀式的轉變主要是從在天地會結拜發展到拜會時以象徵『木場城』的木斗為核心，從而圍繞木斗所進行的戲劇性發揮。」（頁100）

第三章「羅生門」引用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手抄本《先福奏摺稿》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江西省泰和縣縣官徐迪惠的日記（即《國家圖書館藏·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53冊）兩份新史料。這兩份新史料「主要不是最終呈交到朝廷的奏摺，而是在奏摺形成過程中的文獻」（頁112）。正是因為如此，作者才能在了解相關事件記錄的同時，通過體會文獻上字斟句酌的修改來了解文獻產生的語境和把握地方官員在處理天地會案件時進退兩難的處境。作者分別評述了邊錢會蕭爛腳案、陳紀傳案和徐迪惠日記中徐迪惠、韓文琦、熊遇泰、王贈芳這四位政府官員圍繞着一起涉及「會匪」的闖關案進行的爭論。相關案件分別圍繞着案犯有「序齒」還是沒有「序齒」、「民人爭山」還是「匪徒佔山」和鹽梟中有無「流入匪黨」這三個重要問題展開，從這些塗改過的奏摺和官員日記的記錄中，我們能夠切實地感受到政府官員們在面對涉及秘密社會的案件中所面臨的諸多壓力。這些壓力既有來自朝廷對秘密社會的固有警惕和對地方官員的不信任，又有來自上司和同僚的意見爭論。在多重壓力下，身處其中的官員實在難以把握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官員處理這類案件，事實的真相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如何揣摩上意，以避免引火焚身。本章通過對文獻修改過程和日記記錄的分析，很好地呈現出了歷史現場中當事人的心境，這是本書的一大貢獻。正是因為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下，歷史上許多涉及秘密社會的案件變得撲朔迷離，作者筆下的「羅生門」便是這一含義。

第四章「時勢與場地」聚焦天地會在東南亞華人社區的傳播和影響作者指出，東南亞華人社區形形色色的會黨組織從來源上來看，很難和天地會產生直接聯繫。「比較肯定的觀察是在19世紀前半期，即嘉慶、道光年間，這些會黨沒有多少天地會的痕跡，至19世紀後半期，它們所顯示出的所謂與天地會相關的傳統，與殖民政府政策有莫大關係。」（頁188）（這一說明指馬來西亞地區，除此之外，根據本章論述，東南亞其他地區會社組織與天地會之間的直接聯繫也比較弱。）正是殖民政府基於現實需求的種種想像和定義，使得東南亞華人社區的種種拜會和天地會產生了關聯。而在這個過程中，荷蘭漢學家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的經典著作《天地會》提供了範本作用：「由於它基於在巴達維亞發現的材料為天地會編輯了一套經典的資料

庫，以後的研究者可以引經據典地替東南亞華人會黨加上天地會的外衣」。（頁176）在學者和殖民政府的共同塑造下，一個與「現代西方」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傳統」披上天地會的外衣得以粉墨登場。儘管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其中的謬誤，但是身處殖民社會的華人會黨卻只能在特定的歷史場景和文化語境中加以定義。

第五章，「哥老會」。有關天地會與哥老會之間的關係，學界通常是將其視為繼承或同源關係，但是作者指出「兩者在制度和儀式上均不同，更沒有任何權力繼承的痕跡」（頁198）。因此，作者認為理解哥老會的歷史，考據來源這一研究路數難以依靠，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從考察「哥老會」這一名詞如何出現。從文獻記錄來看，湘軍是「哥老會」這一名詞的製造者。作者通過對曾國藩日記和書信等史料的分析，指出曾國藩在哥老會擴散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曾國藩在處理湘軍中有關會黨的相關案件中，對「哥老會」這一概念的引用和其採取的「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的政策，使得「哥老會」這一名詞得到了公開的機會，助長了其傳播。隨後，將哥老會形象具象化的則是教案，外國報紙將哥老會塑造成熱衷於攻擊教堂的反叛者。光緒十七年（1891）年底發生的梅森(Charles Melsh Mason)走私軍火案，則進一步加強了哥老會的反叛形象。處理該案的張之洞串聯了各地口供，哥老會作為一個勢力龐大的反叛集團的想像便浮出水面了。而這一反叛形象與革命黨的結合實在是順其自然，光緒三十二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爆發的萍瀏醴起義將這一結合推向新高度，也正是在這一事件後，哥老會和天地會被歸為一類。與此同時，在新興的報紙傳媒的宣傳助推下，哥老會從眾多會黨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會黨組織的通稱，並在革命的話語體系中原本只是地方會黨通稱的哥老會內在的反清情緒得以統合。

在結語部分，作者首先回到了社會學家齊美爾的理論，再次指出秘密會社只能作為社團演變的一個過渡這一脆弱性，並強調天地會和哥老會最終的發展只能是「層次化」成為真正意義上擁有組織權力架構的「勢力團體」。而天地會和哥老會跨地域、跨省份的龐大網絡的形成，則是與宋代發明的宗族多線傳承相關。換言之，類似秘密會社實質上是一種「虛擬宗族」，因為虛擬宗族違法，所以只能秘密進行。這一行為通過趙世瑜所言的「歷史摺疊」（趙世瑜，〈歷史過程的「折疊」與「拉伸」——社的存續、變身及其在中國史研究中的意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頁1—14）。層層累積發展，最終形成了宗族、天地會、哥老會相互「摺疊」的共同體架構。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便是以儀式為切入點，通過口

供、儀式文本（會簿）等史料，討論身處儀式之中的人是何處境、他們的儀式感從何而來。本書對儀式制度演變的討論，實質上追求的是透過制度創新窺覬歷史發展的過程。作者最後號召歷史學者「回到歷史現場」，在重視文字材料的同時，重視諸如藝術、建築、儀式、衣着、說話等非文字表達媒介，真正做到田野與文獻相結合。

由此可見，本書篇幅雖小，但是作者在書中表達的期望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有所推進的理論追求，着實令人稱道。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在各個章節與諸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之間的理論對話十分密集和有效，這些基於相關議題的討論可為本書的又一亮點。更為難得的是，本書在談及諸多嚴肅的學術議題之時，其文筆卻頗為活潑生動，全書可讀性極強，實屬佳作。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本書的學術價值還在於其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回答了一個中國史研究的重大議題：在傳統中國專制體制下秘密社會組織如何存在並發展？雖然與宗族、會館等可以合法存在的社會組織相比，天地會和哥老會這類秘密會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非典型民間組織，但是其延綿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響力似乎更值得玩味。

正如本書所提及的，歷史學家通常將清代秘密會社的興起歸因為底層社會尋求保護的互助行為，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以所謂「生命儀式」分析天地會的拜會儀式。這些觀點雖在邏輯上能夠成立，並部分符合史實，但是解釋力卻是不夠的。在回答這一問題上，作者另闢蹊徑，從「秘密」和儀式的發展和傳播入手，描繪了一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

首先，作者用齊美爾的理論提出了一個新思路，即「秘密也可以締造社會關係、社會團體」，而秘密發生作用的過程，則是通過儀式的傳播實現的，正是在儀式傳播的過程中會社成員建立起了虛擬的符號認同。同時，儀式傳播還展現了存在感。這一理論預設使以考察儀式發展透視歷史過程成為可能。

其次，通過對天地會和哥老會等秘密會社在不同歷史時期逐步實現「正式化」並廣為傳播的歷史過程分析，展現了會社成員、各級政府官員、朝廷、報紙、漢學家、東南亞殖民政府、近代革命話語等諸多角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這一複雜的歷史過程表明，秘密會社的發展和散播，有其獨特的發生學機制，不可簡單用功能論視之。

最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肯定「秘密」的作用並論述秘密會社在清代發展的歷史過程之後，並未滿足於一般經驗事實的敘述，還試圖為這一歷史過

程提供更深入的解釋。將清代秘密社會的發展和散播與宋代的宗族儀式變革聯繫在一起，並將其與宗族相關聯，成功將秘密社會的發展納入更為宏觀和縱深的歷史邏輯之中，為我們理解秘密社會提供極具啟發性的視角。

「只有走出華南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裡，讓大家對人類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科大衛，〈告別華南研究〉，載《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頁9—40）早在2004年，本書的第二作者科大衛教授便提出了以上願景，本書於2022年出版，距離這一宏偉願景的提出已經將近二十年。誠然，作為一部體量有限的「小書」，要承載上述宏願或許「不夠分量」。但是，從作者開闊的視野和回應的問題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本書確實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結實的一步。

在回應「全中國的歷史」方面，本書將秘密社會納入「泛宗族組織的變體」這一思路，為我們理解中國民間社會提供了縱深的視角。對於秘密社會的這一定位，可以引入更宏觀的中國制度、思想史等領域的討論中，為相關研究提供拓展思路。例如，制度史家馮天瑜詳盡論述了自周秦之變以來，中國長期處於周制與秦制的雙重制度之下的體制狀況，兩種制度之間既有結合又有張力，構成了中國社會特有的歷史生態。（馮天瑜，《周制與秦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如果宗族組織是周制的衍生物，那麼秘密社會作為「泛宗族組織的變體」，亦是某種周制的衍生物，只不過這種「非法」衍生物的生發土壤，應當是周制與秦制之間的固有張力。沿着這一思路思考，便可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所拓展，從而加深我們對整體中國的理解。

在「對人類歷史有更深的了解」方面，本書對「秘密」何以生長、擴散和持續進行了精彩論述，對人類組織的形成機制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解釋。對於歷史中的個體而言，「秘密」本身便具有獨特的魅力，這一魅力便是所謂「虛擬的符號認同」，通過這一認同，人們得以締結社會關係，並在實踐的過程中將「虛」轉化為「實」。這一對人類結社方式的理解，超越了片面的功能主義視角，豐富了我們對於人類共同體類型的認知。

綜上所述，本書雖然篇幅較小，但是很好地做到了歷史人類學所追求的「以小見大」，是一部十分具有想像力的著作。雖然受限於篇幅，本書提出的一些論點只能點到為止，但是並不影響其深刻性和啟發性。

黎家啟

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